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中原大战史话（特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露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6½印张 422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013-0250-2/K·18

（书号 11201·95） 定价 4.15元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内部发行〕

10.15.87
11.1/50/24

编者前言

台湾史学者王禹廷以《感概话陆沉》作总标题，陆续发表他写的关于中原大战（即一九三〇年阎、冯联合反蒋战争）和西安事变两部史著。本辑收录的是“中原大战”部分（《感概话陆沉》一至二十九），连载于台湾《传记文学》八一年四〇卷一期至八五年四七卷五期。“西安事变”部分尚在续刊中，一俟终篇，另编专册出版。

由於立场、观点的不同，作者对历史的分析、解释自与我们相异。但他“根据所知的史料，把中原大战和西安事变形成的过程，予以较详的铺陈。”（见本辑第二页上排第十九行）却是我们选收注视的所在。他用了四十余万字，始自一九二七年六月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与冯玉祥的郑州会议和南京政府蒋介石等人与冯玉祥的徐州会议，终至一九三〇年十月张学良挥兵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将此三年零四个月的演变以及其间他们的分合、明争暗斗、纵横捭阖、用兵策略、兵力部署、作战概况等均有较细致的陈述，在论述此一史事的著作中尚不多见。对于研究此一阶段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惜引用的资料多未注明出处，是其缺点。

文章连载时，每篇一题目，现汇作专册，根据内容，我们为之定名为《中原大战史话》。书中某些攻击我党的词句，有的引自历史资料，有的读者很容易鉴别，所以都保留它原来的面目，特此说明。

目 次

| | |
|---------------------------|-------------|
| 中原大战与西安事变——感概话陆沉之一 | 王禹廷 一 |
| 宁汉分裂大局混乱——感概话陆沉之二 | 八 |
| 南北局势分久而合——感概话陆沉之三 | 一八 |
| 政失重心，军自为战（上）——感概话陆沉之四 | 二八 |
| 政失重心，军自为战（下）——感概话陆沉之五 | 三六 |
| 蒋公复职，重肩大任——感概话陆沉之六 | 四五 |
| 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上）——感概话陆沉之七 | 五四 |
| 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中）——感概话陆沉之八 | 六三 |
| 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下）——感概话陆沉之九 | 七一 |
| 新邦初建，新猷未展——感概话陆沉之十 | 八四 |
| 建设之要，旨在整军——感概话陆沉之十一 | 九四 |
| 权位争执，编遣失败（上）——感概话陆沉之十二 | 一〇三 |
| 权位争执，编遣失败（中）——感概话陆沉之十三 | 一一二 |
| 权位争执，编遣失败（下）——感概话陆沉之十四 | 一二九 |
| 桂系异动，自取败亡——感概话陆沉之十五 | 一三六 |
| 先礼后兵，下令讨冯——感概话陆沉之十六 | 一三七 |
| 内外交迫，冯兵下野——感概话陆沉之十七 | 一四五 |
| 南北混战，此起彼落（上）——感概话陆沉之十八 | 一五五 |
| 南北混战，此起彼落（中）——感概话陆沉之十九 | 一六四 |
| 南北混战，此起彼落（下）——感概话陆沉之二十 | 一七二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一）——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一 | 一八四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二）——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二 | 一九三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三）——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三 | 二〇一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四）——感概话陆沉之二十四 | 二〇八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五）——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五 | 二一七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六）——感概话陆沉之二十六 | 二二五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七）——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七 | 二三三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八）——感概话陆沉之二十八 | 二四一 |
| 中原大战，斫丧国脉（全文完）——感概话陆沉之二十九 | 二四八 |
| 附：有关若干军事史料的补正（书简） | 于翔麟 二六〇 |
| 有关“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的三封函件（书简） | 王禹廷 陈哲三 二六一 |

中原大戰與西安事變

王禹廷

感慨話陸沉之一

神州遭劫的主要因素

國父孫中山先生及革命先烈們艱難締造的中華民國，在海內外炎黃子孫們熱烈慶祝聲中，業已渡過了它的七十誕辰，但是它在大陸，却只屹立了三十八個年頭。我們居住在復興基地的人，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獲致了豐碩成果，過着現在這種安和樂利的生活。懸望大陸同胞，他們處於中共殘暴統治之下，啼飢號寒，水深火熱的悲慘景象，誠不勝其血肉相連的憐念心，和亟圖拯救的責任感。

民國三十年「九一八」事變十週年紀念日，對日抗戰方殷，國家處境極艱。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領導全民浴血抗戰的先總統蔣公，書勉全國同胞。我讀到其中「當年兒童，今已成了。當年樹木，今已成林。」的兩句話，感觸至深，不禁熱淚盈眶。我們播遷來臺，已經超過了三個十年。「河山古今，數不盡興亡恨！」回想蔣公當年「成了、成林」之說，殊覺感

慨萬千。固然大陸動亂不已，臺灣欣欣向榮。「人心思漢」，與日俱增。以三民主義統一全中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可實現。但是，「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歲月蹉跎，煎熬難耐。我們對於苦難奴役中的大陸同胞，應有無限的愧疚。

中華民國未能長久屹立于大陸，是由於中共政權的竊國僭號。中共為什麼能夠得勢移鼎？因素當然很多。總括一句話，乃是出於強烈外患和嚴重內憂的交相煎迫。外患加重了內憂，內憂引致了外患，交織相侵，糾纏不已，政府無力支持，神州就痛苦沉淪了。

這其間，依據所知資料的粗淺研究，我認為北伐成功以後的幾番紛爭，尤其是民國十九年的「西安事變」，實具有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為什麼有此推論呢？請看下面的簡析：
民國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是當年內爭最劇烈、犧牲最慘重的一場內戰。雙方連百萬之師，（

估計兩方面動用的兵力，在一百五十萬人左右。

）決生死之戰。在魯（山東）、（江）蘇、豫（河南）、皖（安徽）四省的廣大地區，血肉相拼，寸土必爭，其慘烈的程度，古今中外的戰史上尚不多見。從五月打到十月，才告結束。敗者固煙消雲散，勝者也精疲力竭。國軍精銳對消，國家元氣大傷，從而產生了如下的嚴重惡果：

如果沒有中原大戰，政府在南方的部隊就不會悉數北調。那麼，初成星火的朱毛共軍，就不會乘隙坐大，形成燎原之勢，蹂躪十數省，幾於不可收拾。政府竭全國之力，圍剿了四、五年，雖然大奏膚功，却未全告殲滅，卒成以後的大患。

如果沒有中原大戰，東北軍的主力，就不會因為支持中央，進兵（山海）關內，東北邊防就不會空虛。那麼，「九一八事變」或不致發生。縱然發生，我們也有相當的實力可資抗拒，或不致演變成爲兩敗俱傷的中、日之間的長期大戰。

如果不因中原大戰而離鄉背井的幾十萬東北

軍，在（山海）關內各地購糧共之際，能夠得到適當照顧，不遭受和一般難民同樣的歧視，（按一、東北軍的待遇及裝備，當年比其他國軍都較優裕。二、抗戰以後，除所謂游離部隊外，國軍的新編都告劃一，裝備則仍有差異。）它們就不致誤中中共的統戰構構，甘放中共一馬，發起魯莽滅裂的「西安事變」，使中共絕處逢生。同時，如無「西安事變」，停止剿共，表面上形成國家統一。日本軍閥或不致急切的發動盧溝橋「七七事變」，掀起全面戰火。中共如沒有這個第二次大舉發展的機會，便不能變成滔天巨禍。

如上所說，中原大戰及「西安事變」的惡劣影響，實堪論定。可是一般人對於「西安事變」的攸關國運，大抵都有相當認識，而對「西安事變」的導因出於中原大戰，似多欠缺瞭解。就是研究現代史的專家學者，對於此一重要癥結，好像也無人公開探討，或因有忌諱而不肯究論，或有所探討而為我不知。用敢不揣冒昧，根據所知的資料，把中原大戰和「西安事變」形成的過程，予以較詳細的鋪陳。並將俄、日兩大惡隣加諸我們的危害，以及抗戰勝利以後得失失利的概況，略加敘述。

俄帝是中國的世仇大敵

痛論大陸沉淪的原因，應該先從對此影響最大的外患方面說起。

筆者好幾年前，參加在陽明山舉行的一項重要會議。時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當局在

其工作報告中，聲稱約約的提出了改變外交政策的構想。消息傳出，引起中外各方的注意。有關係及此事的傳播，一時不脛而走。後來政府作了外交政策不變的宣示，某外交部長不久也去職。由此而引起的一些傳言，便告澄清。但因美國政府對我背信棄義，我國外交處境日漸不利，某些人爲了突破外交上的困境，由幻想而聯俄的呼聲，仍有所聞。在臺北發行的某一週刊，曾經很機巧的提出「用俄而不聯俄」的說法，即其一例。國際間本無永久的朋友或敵人，只要於國家有益，外交政策的更張，並無不可。惟以我國處境，不論就目前或永久着眼，如果聯俄，一定是利未見而害先至。清末聯俄制日，民初聯俄容共，抗戰勝利後棄外蒙而與蘇俄訂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等歷史上的教訓，應該值得我們深切反省。所以我與朋友閒談，如果觸及此一問題，總期以爲不可。因此，談到大陸沉淪的外來影響，我必須首先提出蘇俄。它是我們的世仇大敵，在可預見的將來，無論世局如何演變，它決不會成爲我們的善鄰或友邦。對中共如此，對我們亦然。

近代中國的陸上外患，當推俄帝（帝俄和蘇俄）和日本。俄國陰狠，乃侵略中國的先驅惡霸。日本瘋狂，是侵略中國の後起兇煞。兩惡相加而交乘，其侵略中國的方法雖有不同，而目標則一。

遠在西元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俄帝伊凡第三滅欽察汗國，結束了蒙古人對俄二百四十年的統治，就向東方開始發展。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它們的勢力到達鄂畢次克海，

伸展到亞洲大陸的這一端，向中國的北邊沿新疆、蒙古及東北一帶，滋擾侵佔。這時正是明、清兩代的興亡變遷之交，中國的漢、滿兩族，拼全力作鬩牆之爭。疏忽了對於這個北極熊的防堵，給它一個從容佈置、逐步覆食的好機會。到了一六八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中國內部局勢大定，清廷乃派兵戡定黑龍江，驅逐俄國人的入侵勢力。經過兩次雅克薩城之戰，俄軍失敗，停戰言和。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八月，締結了尼布楚條約。此後三百年來，蘇俄和帝俄一脈相承，視中國國勢之強弱，運用巧取豪奪的各種手段，對中國侵凌備至。除了跟其他列強一樣，締結不平等條約，攫取通商築路、租地、賠款等不法利益之外。它利用我國的無知（清初對外的瞭解不夠及其對邊疆曠野的漠視。）與無力（清末對外的抗力不足），掠奪我國的領土，從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簽訂尼布楚條約開始，經過滿清後期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到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爲止，先後與中國簽訂了瑛琿條約、北京條約及續約、塔城條約、伊犁條約。在這五項條約中，帝俄佔了中國領土四百九十三萬餘平方公里，約爲中國現在全部版圖（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四強。此外，咬使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獨立，以及零星偷佔沒有形諸文字記載的，尙未計算在內，爲數當更不少。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戰以後，俄、德、法三國，聯合出面干涉，促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俄國藉機誘迫清廷，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簽訂中俄密約。

斯乃清廷昧於國際大勢，採納李鴻章的主張，企圖「以夷制夷」，聯俄制日的最大失着，也是李鴻章一生事業中的一大敗筆。而中國付出的代價，則是俄帝租佔我旅順和大連兩要港，又把它西北利亞鐵路，貫穿黑龍江、吉林兩省，展築到海參崴。中國廣袤的北部邊疆，乃處於它全面長線包圍之中，且插入東北腹地，把東北置於它的直接控制之下。

日俄對峙攫奪東北

中國的東北地區，因為地略位置重要，煤、鐵等重工業原料富饒，日、俄兩國皆處心積慮的亟謀攫佔。日本因甲午（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之戰勝了中國，吞嚥朝鮮（韓國），覬覦東北，與俄國形成對峙衝突。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日、俄開戰，日勝俄敗。原為俄國租借的旅順和大連兩要港，俄國竟還行轉租給日本。自此俄國勢力退出南滿，與日本劃分勢力範圍，南滿歸日，北滿歸俄。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蘇俄革命成功，披上馬（克斯）、列（寧）共產主義的外衣，實際上更瘋狂的進行其大斯拉夫主義的擴張。只因它當時內部尚未鞏固，外面又遭受反共國家的夾攻。處境孤危，必須力圖突破，乃把目標指向於中國。於是它以偽善的面孔，揚言廢除帝俄時代對中國所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放棄有關特權，以爭取中國人的好感，誘致中國人入彀。旋派代表來華，向中國的南北敵對勢力之間，尋求締交結盟。它在北方碰了壁，却得逞於南方，於是而有「聯俄容共」的局面之出現。

蘇俄遂得施展其對中國的更大陰謀，輸入共產毒素，扶植中共勢力，從內部滲透顛覆的毒辣手法，着着進行，大收其效。此後二十餘年，日本外侵，中共內亂，錦繡神州，遂告變色。我們回顧由當年「聯俄容共」到現在反共抗俄的重大轉變和慘痛教訓，不禁感慨萬端。

與此同時，蘇俄對中國邊疆的窺食，並未放鬆。它策動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獨立，成吉思汗的幾個不肖子孫，竟受騙脫輻而去，成爲蘇俄的附庸。它圖謀攫取新疆，幾度派兵入侵，並蒙養扶植少數野心份子，妄圖在新疆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國」。初賴楊增新（雲南人，清末即在新疆爲官，民國成立後，主持新疆省政，爲時甚久，民國十七年被刺身死。）妥善應付，未能得逞。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它扶植盛世才奪取新疆政權，對我國形成半獨立的狀態。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盛世才良心未泯，乘德國揮軍攻俄，蘇俄自保不暇，無力東顧的機會，毅然向國民政府輸誠，把新疆完完整整的投回中華懷抱。在東北因爲日本勢力正盛，只好暫時收斂。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之後，我政府對日本採取了至爲寬大的政策，期與這個同文同種的鄰邦，釋仇修好，共同爲兩國及東亞的和平進步而致力。這個目光短淺的日本，却因我們國勢的變遷而改變態度。它於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竟然頑顏媚共，搶先承認了中共政權。近年來卑躬屈節，與中共大事勾搭。臺灣因地緣關係，在經濟貿易上無法擺脫與日本彼此依存的需要，使日本大獲實質上更多的利益。中日兩國之間的

關係將來如何演變，當視我們的國運以爲斷。惟其不能再成爲我們的大患，似可斷言。但它已往瘋狂侵華的罪惡行爲，從而導致我河山遭劫的大災難，中華兒女却永遠無法忘懷。

日本是侵華的後起兇煞

日本這個蕞爾小邦，本來是以中華文化爲主流的東方文化的交流之一。千餘年來，一直與中國和善相處。它從中國盛唐時代開始，深受中華文化的薰陶，歷久而不變，成爲那時中國鄰邦中比較開發的一個國家。十九世紀中葉，歐風東漸，中國和日本都曾力圖維新。日本因全國振作而大告成功，中國因清室頹預而未收實效。不意日本於維新奏功之後，匪僅對中國不思回饋，共存共榮。反而變本加厲，對中國大事侵略，其兇狠遠甚於其他各帝國主義者。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及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它對中、俄兩國作戰獲勝之後，兇鋒及狂圖更趨高漲。它們說滿洲（東北）是它們的生命線，必須攫奪而後已。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利用歐戰方酣，列強無暇東顧，誘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件。不但視我東北爲其犖犖，從事於各種發展。即在其他各地，亦取得許多特權，肆意橫行。且對中國各派系勢力，多方操縱運用，製造中國內部的分裂，俾利其分割吞噬的野心。它以和平而漸進的手段，不能達成其侵華的速效，竟出諸武力的掠奪。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兵，公然出兵濟南，釀成「五三慘案」，幸賴我政府委屈求全，撓道北伐，才未演

成更大的事變。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囊括我東北四省，建立偽「滿洲國」，又復策動內蒙獨立及華北五省的特殊化。終致爆發了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掀起對中國全面征服的軍事行動。它對中國逐漸蠶食之不足，竟想以武力全部鯨吞。以後且高唱建立「東亞新秩序」，直欲君臨全亞東。當中、日全面戰爭未起之時，遠東乃是中、日、俄三國角逐相持的局面。中國在求自保，俄、日兩國則各圖發展，而以中國為侵略征服的目標。但日本和俄國的處境又各不同，蘇俄內部未穩，國力未充，處在列強圍困封鎖之中，不敢與兵言戰，乃向各國輸入共產毒素，想從內部顛覆中「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一毒計在別處未能收效，在中國却倖而得逞。就當時的兵略運用而言，中、日、俄三國的軍事企圖，都希望三者之中另外兩個開打，自己則置身事外。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中、俄兩國在東北爆發的局部戰爭，導致中、俄兩國斷絕邦交，正為日本所樂見。但這次局部戰爭，並未擴大，迅即收束，中、俄兩國亦僅斷絕邦交，另無其他更惡化的演變。這不是說蘇俄放棄了對華侵略，而是形勢所迫，不得不採取武力以外更毒辣的手段。它一面扶植中共，助長中國的內亂，一面挑動中、日間的更大衝突。它為了遂行此一詭計，竟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把它經營的中東鐵路，賣給日本，暫時向後撤退。既可紓其東顧之憂，更以鼓勵日本擴大對中國的侵略。

蔣委員長的先知與遠見

就中國來說，並非忽視或屈服於蘇俄的挑戰，而是統一尚未完成，國基尚未鞏固，面對俄、日兩大強權，不得不從事隱忍，以免兩面樹敵。可是目光短淺、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閥，眼見中俄息爭，它無法從中取利。更不願見中國真正統一，走向復興強盛之路，喪失了它侵略的機會。於是便掀起了對中國的全面戰爭，妄圖一舉而征服。結果則兩敗俱傷，使俄人坐收漁人之利，實乃中、日兩國歷史上之大悲劇。有人說這一悲劇的發生，是由於中、日兩國缺乏大政治家之所致，其實並不盡然。日本那時沒有具氣魄、有力量的大政治家，未能約束其軍閥，乃使少壯軍人成為不羈之馬，橫衝直撞，無所底止，幾釀亡國之禍，誠乃事實。中國則反是，當時主持國政的蔣介石委員長，的確不失為一位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他對日本侵華的悲慘結局，早已洞若觀火。故當日軍對我煎迫日急的嚴重關頭，一面對不甘受侵力主奮戰的國人，儘量開導，力持鎮靜和隱忍；一面積極從事於擴外必先安內的工作，以為充實國力外禦其侮的準備。他於日本軍閥對我橫行不已之際，仍不忘對其苦口婆心的忠告。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他口述「敵乎？友乎？」長文，由陳布雷筆記整理，徐道鄰具名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真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曉諭國人：「中國則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這

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胸襟。可惜「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故事，未能感動截止日本軍閥的狂妄野心，它們終於「狂夫趨井」，自取滅亡。中國則於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對日本寬大為懷，「以德報怨」，未作「投石下井」的報復行為。事實證明了蔣公的先知和遠見，事實也兌現了蔣公偉大的德操和襟懷。大政治家之可尊貴者在此，大政治家之可敬愛者也在此。

「鵝蚌相爭，漁翁得利。」在中、日、俄三角相持中，日本瘋了！中國慘了！克奧姆林宮的主人則在那裏擦拳摩掌笑了！於是在中、日兩國兩敗俱傷之後，蘇俄攫取了勝利的果實，睥睨世界。中共也因而坐大，為禍神州。現在中共、俄共雖然乖離，但其帶給全人類的災難，還不知伊於胡底？追源溯始，皆由日本侵華而引起。言念及此，曷勝痛憤。

軍閥為虐南北混戰

前面說過，連續不斷的內憂，以民國十九年的中原大戰影響最大。為什麼會發生中原大戰？乃是由於北伐成功以後的許多糾紛。國民政府為什麼要舉兵北伐？乃是由於北洋軍閥的亂政禍國。因此對於此中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不能不從頭說起。

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意蓋言立國大地，如受敵國外患的侵凌壓迫，其朝野必能惕厲奮發，團結圖強。否則便易於墮落腐化，因自伐招致人伐而歸覆亡。中國那時在俄、日兩強交侵之下

，外患的嚴重，直到了國家存亡迫於呼吸的境地。深堪痛惜的是我們有各方，並未因此而惕厲奮發，作團結圖強的努力。反而做了不少自伐而招致人伐的痛心事。我認爲孫中山先生領導、蔣公繼承的國民革命，從清末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廣東惠州之役開始，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陸沉淪爲止，在這五十年來的擾攘戰爭中，排滿討袁是爲了建立民主政體，對日抗戰是爲了保障國家生存，剿共戡亂是爲了維護傳統文化。這都是意義重大，不容避免的聖戰。除此以外，則都是可打可不打。我更認爲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內部，都難免有若干糾紛。解決此種糾紛之道，最好是運用化解的途徑，而不宜採取排除的手段。化解可以化敵爲友，召致向心力與祥和之氣，儘可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排除則每每化友爲敵，增加離心力與暴戾之氣，操戈相向而愈演愈烈。如果民國初年，尤其是北伐成功以後，有關和有力的重要人物，都能夠善自剋制，相忍爲國，未嘗不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在和平競爭中謀求發展。那就不至於兵戎相見，大傷元氣，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了。

與風範，實應博得千秋萬世的無限景仰。那時革命的形勢雖不盡利，統一的基礎却已建立。袁世凱如能忠貞謀國，與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革命黨人真誠合作，共圖新中國的建設。一方富於理想，一方嫻於實務，兩長相濟，定可爲民國奠立良好的始基，漸躋於強盛之境。可恨袁世凱喪心病狂，迷戀權位，承襲帝制餘毒的習染，接受內外邪惡份子的慫恿，日趨於專制統治，違反時代潮流的悖逆行徑。又惜某些革命黨人，年輕氣盛，（居於領導階層的人物，大多在三十歲左右。）看事容易，處事操切。或不完全接受中山先生的領導，或與袁氏黨羽及其御用組織沆瀣一氣，以致革命陣營的力量渙散削弱。或在力量絕對懸殊的劣勢之下，冒然與袁世凱公開決裂。如此相激相盪，乃有民國二年二次革命的發動與失敗。此後在革命勢力陷於極端低潮的時候，袁世凱子智自雄，以爲「天下莫予毒也已」，竟演起帝制自爲的醜劇。他在全國反對打伐聲中暴殄，可謂死有餘辜。袁氏既死，粗告統一的局面，爲之崩潰。從此軍閥亂政，全國擾攘，干戈不息，遍地烽煙。由南北之間的對峙與不斷征伐，演變而爲各自內部之間的混戰。國事敗壞，不堪言狀。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這種混亂的局面，才告了一個段落。

俄共成功禍延中國

共產思想，溯源已早。到了十九世紀初葉，經過馬克斯和恩格斯相繼整理，始成爲一種有體系的思想學說，逐漸傳播，但僅局限於學術領域

的研究。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蘇俄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制度的國家。它迭次對中國發出友善表示，引起中國人的注意與憧憬。國民黨在上海發行的國民日報和其他不同背景刊物，陳獨秀等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及每週評論等雜誌，對於蘇俄革命及共產思想，多所介紹。然僅爲文字的鼓吹，尙無具體的行動。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春，蘇俄御用之第三國際，派遣代表維丁斯基（中譯爲吳廷康）等人來華，策動共黨組織。他先後在北京、上海兩地，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接觸。是年五月，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推陳獨秀爲書記，向國內外各地發展。八月，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十一月，創辦共產黨月刊。經過一年多的活動，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舉行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才算正式成立。出席的代表爲上海、北京、廣東、武漢、長沙、濟南各二人，旅日本的代表一人，共爲十三人。其中共僅有黨員五十七人，可見其發展之不易。它們因爲人數過少，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選出由三個人組成的中央局，以陳獨秀爲書記，張國燾和李達，分任組織及宣傳委員，推動黨務。此外，中共旅法支部，亦於稍後（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在巴黎成立，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李富春、朱德等，均爲其中的成員，乃中共發展初期的第二大主流。與此同時，第三國際又派代表馬林來華，與蘇俄駐華的使領人員，紛向中國南北各方，進行活動。北方的幾個實力派領袖，皆視之爲洪水

辛亥開國，是我們第一次大有可爲的好機會。其時中山先生爲了急欲達成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目的，不惜委屈求全，與手握實權重兵的袁世凱，尋求妥協，把總統的大位讓給他，換取其贊助革命。這種屈己爲國，敵視尊榮的偉大襟懷，

機會，皆因未能善自把持，自亂步伐，再錯三錯，鑄成大錯。

辛亥開國，是我們第一次大有可爲的好機會。

猛獸，駁予拒絕。馬林乃把活動的目標指向南方。

要明瞭馬林到南方得逞的原委，應先敘述南方政情演變的概況。

民國六年，張勳復辟的醜劇失敗之後，馮國璋上臺，段祺瑞主政，毀棄約法，另組國會。中山先生在上海聞信，立即南至廣州，組織軍政府，出任海陸軍大元帥，號召護法。但是兩廣（廣東、廣西）的實力派陸榮廷、莫榮新等不奉號令，另行通過軍政府為合議制，選舉中山先生、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林葆懌等七人為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為主席總裁。中山先生乃通電辭大元帥職，離粵赴滬，從事著述。

民國九年十一月，駐軍閩（福建）西的粵軍陳炯明，率領所部回師廣東，逐走護法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迎中山先生由滬返穗（廣州）。十年四月，組織中華民國政府，此為南北對峙中南方自成中央政府之始，中山先生被選為非常大總統。陳炯明因功被任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等四要職，權力甚重。他邀陳獨秀到廣州，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乃得乘機從事於共產思想的宣揚與組織發展，但廣東人視之為「陳毒獸」，不肯接納，故效果不大。他旋回上海會晤馬林與之商議，同意接受第三國際政策與指示。並介紹馬林到廣州，與陳炯明見面。陳炯明雖然同情社會主義，但不贊成蘇俄式的極權政制，因而所談不合。時中山先生駐節桂林，指揮北伐軍事。馬林乃轉赴桂林，晉謁中山先生，經過一

番傾談，彼此均獲得初步瞭解，聯俄之議遂起。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因對中山先生的政策主張，有不同的意見，傳出不穩之訊。中山先生乃免除其本兼各職，並回廣州鎮撫，陳遂走香港。是年六月，陳曠使其部將林虎，砲轟觀音山，中山先生被迫離粵赴滬。適馬林再度來華，他一面傳達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借力發展。同時他再度晉見中山先生，作進一步的洽談，請允許中共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增強革命的力量，並主張以武力奪回廣東。這奪回廣東作為重振革命聲勢的根據地，實為當時最迫切的需要，自為中山先生所樂聞。但對中共黨徒加入國民黨，認為事關重要，尚須從長考慮。嗣與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重要同志幾度集議，雖然有人反對，有人贊成，最後還是獲得了接納的結論。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共份子，乃相繼加入國民黨，是為國民黨容共之始。十二年十一月，蘇俄政府代表越飛到上海，與中山先生續作談判，經過十多天的詳細商討，得到更進一步的結論，發表孫越飛聯合宣言，其中雖有共產主義及其組織不適於中國的宣示，但聯俄容共的政策，則已明白確定。為了適應此一新形势，參照俄共組織以改造國民黨，亦為越飛向中山先生提出的另一重大建議。中山先生指派丁惟汾、陳獨秀、陳樹人等起草國民黨改進黨案。蘇俄政府加緊腳步，着着進行，又派鮑羅廷來華，中山先生聘其為政治顧問，參與國民黨改組的策劃督促。鮑羅廷向中山先生提出的改組國民黨建議，是以蘇俄共黨的組織型態為參考的藍本。

聯俄容共引狼入室

此時盤踞廣州的陳炯明及其部眾，已被逐走。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廣州。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中共的跨黨份子陳獨秀（未出席）、李大釗、于樹德、毛澤東、譚平山等，均在其列。在此以前，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認為共黨份子加入國民黨，具有極大陰謀，「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取其禍，奸人謀毀吾黨，其計甚毒，不可不防。」曾向中山先生提出檢舉。一全大會開會期間，黃季陸和方瑞麟，也曾提出一人不能同時兼隸兩黨黨員的「跨黨問題」，引起一場爭辯。中山先生對於國共合作，深具信心，認為必能以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操，感化盲從蘇俄的中共黨徒，共為國民革命而致力，故不為動。李大釗則代表中共強調：「為完成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必須將他的領導權交給國民黨。就在這一大前提下，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接受國民黨的黨章紀律和政綱。」汪精衛和胡漢民，也先後作了對切的說明，祛除了一些人的疑慮。於是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便由大會通過，成為定案。同時在修訂的國民黨黨章和政綱中，確立了國民黨的「民主集權制」及扶助農工政策。這便是當時及以後所稱的「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之由來。一全大會開始時，中山先生指定主席團五人，李大釗為其中之一。以後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候補執委十七人，共黨份子李大釗、譚

平山、于樹德、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韓麟符等十人，均在其列，佔全體執委及候補執委總人數的四分之一。而在中央黨部的六個部長中，中共份子譚平山爲組織部部長，林祖涵爲農民部部長。六部中六個秘書（掌管實際業務）中，中共份子佔了一半。大會爲了大力推動各地的黨務開展，決定設立北京、上海、漢口、四川、哈爾濱五個執行部（哈爾濱執行部未設立），代表中央指導和監督各地區的黨務。每一執行部管轄幾個省區，均有中共跨黨份子參加。以後又決定派出籌備員，分赴直隸（河北）、山東等十四省籌辦黨務，中共跨黨份子擔任籌備員者亦佔一半。

從此以後，中共份子在鮑羅廷庇護嗾使之下，大事活動，一面擴展它們自己的組織，一面在國民黨內篡奪權，製造分裂。國民黨內乃有親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之分，形成壁壘，時生糾紛。中共份子居間操縱運用，更有利於其發展。國民黨中忠貞有識之士，認爲禍機已著，大生警惕。孫科、黃季陸等首先向中央黨部提案，請予制裁。鄧澤如、張繼、謝持等，跟着也向中央黨部提案彈劾。張繼對中山先生的口頭陳述，語態尤爲激烈，惜事成定局，皆未發生效果。

於是，中共黨徒乃在國民黨的掩護之下，由中央到地方，大大的展開了篡奪權的陰謀活動。尤其在民國十五、六年間，隨着北伐軍事的推進，它們發展的更快速，更瘋狂。湖南、湖北、廣東、江蘇、浙江、陝西等省，叛亂暴動，層出不窮，社會驟然，將釀大變。若不是國民黨當機

立斷，厲行清黨分共，予以有力的遏阻，恐怕赤禍滔天的浩劫，不會延遲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後才發生了。

以中山先生的睿智，何以會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說起來蓋有內在和外在此的雙重原因。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建立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進而躋世界於大同。可是辛亥開國之後，南北軍閥，割據亂政，到處是烏煙瘴氣，漆黑一團，連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也不例外。中山先生爲達成他革命救國的宏願，崎嶇嶺嶺，艱苦奮鬥，屢受挫折，終鮮成就。他既無可據的基地和武力，可資運用，便想採取「以敵制敵」的策略，消滅北洋軍閥。於是聯直（曹錕、吳佩孚）倒皖（段祺瑞），聯奉（張作霖）倒直的活動，不斷進行。可是聯來倒去，終是以暴易暴，無助於革命大業。國民黨經過幾番改造，其組織與紀律，依然鬆懈廢弛，不能發揮應有的力量，完成進一步的歷史任務。他與第三國際及蘇俄代表幾度接觸以後，認爲蘇俄革命的成功，係由其共黨組織的嚴密有力之所致，乃有改組國民黨成爲一個組織健全的革命政黨的願望。中共黨徒鼓其如簧之舌，直接間接的向他表示諛誠。「君子可欺以其方」，他乃接受其個別入黨，以加強革命的力量。此爲聯俄容共的內在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各國，對中國的態度皆較冷淡，除了維持其在華的既得利益之外，不願多所插手，更不會贊助革命。日本則對中國具有很大的野心，某些日本人，對於國民革命固曾有所助力。但擁有實權實力的政客和軍閥

，則與北洋軍閥多所勾結，成爲國民革命的阻力。它們這種不同的作法，其用心無非想陷中國於混亂分裂，俾利於它們的侵略。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亟須外力支援，他在歐、美和日本得不到，便不得不另求發展。恰好蘇俄革命成功，給中山先生以很大的鼓勵。其對中國各種僞善的表示，正合中山先生的需要。於是藉俄援以及早完成國民革命，毋寧是順理成章之事。此爲聯俄容共的外在原因。

積此雙重原因，中山先生便採取了聯俄容共的權宜政策。想不到沒有達到爲虎添翼的願望，却招致引狼入室的惡果，釀成了以後的無窮禍患。爲達目的而誤用手段，難免有傷日月之明。這一點，我們似不必爲之曲意隱飾。（未完待續）

（原載：傳記文學〔台〕一九八二年
四〇卷 一期三二—三八頁）

寧漢分裂大局混亂

王禹廷

感慨話陸沉之二

容共反共導致分裂

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在廣州宣告成立，採合議制，皆由汪精衛任主席。這是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南方自組的中央政權機構。此一國民政府，幾經播遷，由廣州，而武漢，而南京，而重慶，抗戰勝利後又回到南京。直至民國三十七年三、四月間，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在南京集會，依據憲法選出總統。先總統蔣公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組織新的中央政府，國民政府的名號，才告停用。但至現在，仍有人偶把中華民國政府，稱為國府者。

民國十五年三月，汪精衛因故出國，譚延闓代理主席。稍後，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由蔣介石繼任。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積極準備北伐。七月一日，軍事委員會頒布軍事動員令。九日，蔣總司令在廣州就職誓師，大軍即行出動，揭開了國民革命的歷史新頁。

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民國十四、五年的冬、春間，在天津、北京（平）一帶，與奉軍及直魯軍展開激戰。稍後，吳佩孚與張作霖釋嫌修好，合力夾攻國民軍。國民軍孤軍奮戰，漸感不支。十五年三月，馮玉祥赴蘇俄求援。國民軍經過長期苦鬥之後，敗退綏（遠）西。九月，馮玉祥由俄回國，收集舊部，組成國民軍聯軍，誓師五原，繞道甘（肅）、陝（西），響應北伐。

由廣東出動的北伐大軍，很快的進出湘（湖南）、鄂（湖北），攻克武漢，收復（南）京、滬（上海），底定江南。由綏（遠）西出動的國民軍聯軍，也很快的進出甘（肅）、陝（西）底定西北，進薄中原。國民革命的聲勢，立時為之大振。如果乘勢積進，不難深入幽燕、痛飲黃龍，獲致更大的勝利。不幸革命陣營的內部，因容共反共的主張不同，而告分裂。由廣州遷到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在蘇俄顧問鮑羅廷操縱之下，繼續執行其容共政策。部份國民黨高級領導人士，對此則發生懷疑與不滿，而有不同的

意見，雙方漸生裂痕。同時自國民黨改組及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無論黨務、軍事，均建立了一定的制度。惟自北伐軍興，進展迅速，在戰地一切措施，均由革命軍總司令權宜決定，逕行處置。引起某些中央委員的誤會與不滿，認為總司令有越權專擅之嫌。俄、共黨徒乘機挑撥，又加深一重裂痕。十六年三月十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通過要案多起。其中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及修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兩案，對總司令的職權大為削弱，以「防止軍事獨裁的傾向」。如此一來，總司令的職權大受限制，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如何能適應機宜，迅赴事功？自為精誠為國，勇於負責的蔣總司令所不甘。

汪精衛回國赴武漢

十六年四月一日，汪精衛應武漢方面的邀促，歸國至滬，宋子文率派由漢口遠道來迎，首先登輪與汪晤談。汪在上海與國民黨要人蔣介石、張人傑、吳敬恒、李煜瀛、蔡元培等迭次會晤。

在他們的會談中，有幾則應該一提的重要對話。

吳敬恒對汪說：「陳仲甫（獨秀）他說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了。」

汪答：「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

汪對李煜瀛、蔡元培說：「我過莫斯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而變更的。」

汪對吳敬恒說：「共產黨實以本黨爲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

汪對白崇禧說：「要將叛逆民衆捆起來。」

更重要的則是汪、蔣兩人的對話：

汪說：「介石，如果這一次東南與武漢開戰時候，如果你失敗了，我們國民黨就要從此消滅，共產黨必就此起來。如果你得勝了，武漢被東南打倒的時候，國民黨就要恢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況，要是恢復到這種狀況的時候，無論右派的軍隊，左派的黨員，一定不會同你蔣介石合作，你蔣介石在黨裏的生命，怕要從此消滅。」

蔣答：「現在不是這個問題，現在是國民黨生存的問題。如果國民黨可以生存的時候，那麼無論什麼責任，我都可以擔負起來，決不能自己不負責任，從中取巧，來做一個好人。現在我們只有不管成敗利鈍，同共產黨分離，就是將來國民黨失敗了，我個人可以負起責任的，說國民黨之消滅完全是我蔣介石一個人攪出來的也可以。如果共產黨被我們國民黨消滅了，那只要他是純粹國民黨黨員，能爲本黨奮鬥爭氣，無論什麼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

，都可以不管，總要把共產黨消滅了再講。……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來，那時你不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爲本黨，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武漢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會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

我們看罷上述的談話，吳敬恒所說「陳獨秀他說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成共產國了。」蔣對汪說：「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均不幸而言中。其實汪精衛由於以後的行徑乖謬，豈僅是國民黨的罪人，乃成爲國家的罪人了。至於汪對蔣說：「你蔣介石在黨裏的生命，怕要從此消滅。」則幸而未言中。蔣公在黨裏的生命，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更加光大，他堅決反共，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戰勝日本，乃是中國歷史上數得出來的偉人。

蔣總司令當時爲了爭取汪精衛的合作，支持其復職，曾於四月三日，通電國民革命軍各級將領：「……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惟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統一，而中正獨司軍令，以專責成。……俾汪主席得自由行使職權，黨權得以真正集中，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可是汪精衛不爲所動。他却暗中與武漢方面連絡，並與中共首領陳獨秀、周恩來等秘密接頭。五日，他與陳獨秀聯名發表所謂國、共兩黨黨魁聯合宣言，聲明「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重

要。」並針對國民黨人正在醞釀中的反共行動提出警告：「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於是汪精衛乃於四月六日，潛赴武漢，復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民黨中央的要職，更增長了武漢方面的聲勢。在南京、上海兩地的國民黨堅決反共的有力人士張人傑、蔡元培、吳敬恒、李煜瀛等，乃與蔣總司令合作，策劃清黨反共。九日，張人傑等發表護黨救國通電，斥責武漢方面的種種謬舉。十二日由上海開始，厲行清黨。十八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至是，南京和武漢的兩個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乃形成東西對峙之局，此即所謂寧漢分裂。

三路並進會師中原

寧漢雖然分裂，各行其是。但因張學良率領的奉軍精銳，深入豫（河南）南，進逼武漢。其一部進至洛陽，指向陝西。孫傳芳、張宗昌兩部大軍，陳師（長）江北，窺伺（南）京、滬（上海），革命軍如不齊一步驟，合力北伐，即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以正統自居的武漢國民政府，乃於四月間宣布繼續北伐。四月一日發布命令，免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職務。六日，任命蔣介石、馮玉祥爲國民革命軍第一、二集團軍總司令。並以何應欽、程潛、李宗仁、唐生智爲第一集團第一、二、三、四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於鄭州會師後，回師武漢。六月二十五日，升格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十七日，因知南

京即將另組國民政府，又下令免除第一集團軍蔣總司令的職務，並開除其黨籍。另令第一集團軍四個方面軍，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除第二方面軍程潛表示服從，歸附武漢，唐生智原在武漢外，何應欽和李宗仁，對於此一命令，並未接受。二十二日，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因為形格勢禁，不敢輕舉妄動，保持觀望態度。蔣總司令對於武漢方面對他職務的任免，未加理會。注全力於北伐軍事的部署。南京武漢及西安之間，經過一番奔走協商，決定同時與師。

蔣總司令於五月九日，在南京誓師，立即頒布出動命令：以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路軍總指揮（第二路總指揮由蔣公自兼，白崇禧代理。）分率大軍渡過長江，沿津浦鐵路兩段及其兩側地區，向北進攻。當面之敵是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和張宗昌的直魯軍。

馮玉祥於五月一日在西安就職誓師，分兵五路：馮自兼中央軍總司令，孫良誠為前敵總指揮。徐永昌、孫連仲分任左、右兩路軍總司令。岳維峻、宋哲元分任南、北兩路軍總司令。岳維峻是原國民二軍的新撫之衆，戰力尙欠充實。宋哲元留駐寧夏，準備與閻錫山協力，回師綏遠。西沿京（平）綏鐵路東進，攻略張家口，真搗北京。徐永昌原定假道山西，出娘子關襲取石家莊，切斷奉軍前後方的連絡。但他進入山西後，被閻錫山扣留，未能按照預定計劃實施。且被閻錫山收撫，加入晉軍系統。宋哲元也因情況變化，改調陝西。所以馮玉祥的五路大軍，實際上只有

他親領的中路是主力，出潼關沿隴海鐵路東進，當面之敵是盤據靈寶、陝州一帶的劉鎮華所部鎮嵩軍（劉原受吳佩孚委任為陝甘剿匪總司令，圍攻西安，被馮軍擊敗，退據豫西地區。）和洛陽附近地區的萬福麟所部奉軍。孫連仲的右路軍，出荆紫關進攻南陽及襄陽、樊城。當面之敵是吳佩孚所屬的于學忠、張聯陞等部直軍。

唐生智於四月十九日在武昌就職誓師。指揮年前由廣東、湖南出動，擔任正面進軍，力破強敵，進克武漢的第四軍（張發奎）和第八軍（唐的基本部隊）擴編而成的五個軍，以及源出直系，新附革命的新雲鶴所部，分兵三路，向北進攻。中路軍由唐生智自率第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各軍，沿京（平）漢鐵路北進，以鄭州為目標。右路軍由張發奎率領第四、十一兩軍，沿京（平）漢鐵路東側地區北進，以開封為目標。這兩路當面之敵，是張學良所率的奉軍精銳主力。左路軍由靳雲鵬率領所部，沿京（平）漢鐵路西側地區北進，對據守豫（河南）西南及鄂（湖北）西北地區的直軍，嚴密戒備，掩護中路軍的側背安全，並策應中路軍作戰。

以上三面出動的北伐大軍，經過連番激戰，大獲勝利。張學良率部由河南渡黃河北撤，孫傳芳和張宗昌兩部退往山東，吳佩孚僅存的殘部全被殲滅。分途對進的三路北伐大軍，馮、唐兩部於六月初先後在鄭州、開封會師。馮部繼續東進，稍後也與由南京北進的革命軍在徐州會師。至此，中原大地，乃告肅清。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在他逝世以前，幾

度由廣州出師北伐，始終侷促於兩廣（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及福建諸省的部份地區。且旋起旋仆，無法開展，有時連廣東基地也不能保持。此番與師以來，不一年而大奏膚功。固由於蔣總司令指揮若定，戰略戰術運用的神妙，以及將士們作戰奮勇。但更重要的還有下列的各項重要因素：

北伐致勝的重要因素

其一、人心思變。北洋軍閥亂政多年，國事日非，人民對其由厭惡而怨恨，渴望有一個新局面出現。恰好民國十三年冬間發生了首都革命，國民黨人在北方大事活動，中山先生應邀北上，三民主義深入人心，革命浪潮瀾漫全國，給北伐進軍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精神支援力量。

其次，策略高明。民國十四、五年間的北洋軍閥大勢力，計有奉軍、直軍，以及源出直系自成局面的孫傳芳五省聯軍。如果它們結合為一，則非國民革命軍所易克。國民革命軍有鑒於此，當時採取的策略是打倒吳佩孚，妥協（連絡）孫傳芳，不管張作霖。一方面大事宣揚，一方面派人運用，乃能大收其效。故當革命軍與吳佩孚所屬的軍隊，在湖南、湖北間酣戰之時，孫傳芳按兵不動，坐觀成敗。張作霖遠在北方，無意也無法應援。革命軍把吳軍打垮之後，立即掉頭收拾孫傳芳，最後再打張作霖，便把敵人各個擊破了。

第三、統戰收功。十五年北伐之前，由黨軍編成的第一軍（何應欽）、粵軍編成的第四軍（

李濟琛，乃是革命的基本武力。加上第一（譚延闓的湘軍）、第三（朱培德的滇軍）、第五（李福林的福軍）、第六（程潛的湘軍）、第七（李宗仁的桂軍）等共有七個軍。它們系統不一，編裝各異，戰力既有參差，圖志也不見得同樣旺盛，實在該不上都是精練之師，面對強敵，殊難謂其有必勝的把握。但革命軍運用統戰策略（這統戰二字，今已成爲中共的專用詞，我想不出更恰當的用語，權且引用。）瓦解敵軍，削弱敵人，爭取助力，壯大自己，乃能戰勝攻克，無往不利。如唐生智本爲趙恒惕所屬的湘軍之一部，由於白崇禧、陳銘樞、劉文島等人不斷的奔走，臨時歸義，編爲第八軍。且任唐生智爲前敵總指揮，率領第四、七、八各軍，擔任正面主攻，建立了赫赫戰功。以後第一集團軍所屬的部隊，大多是由敵軍中策反而來，卽爲很明顯的例子。

第四，軍閥自亂。北洋軍閥的實力，本來遠較革命軍爲強。但它們陣營分裂，互爭雄長，自相殘殺，力量對消。如直皖、及兩次直奉之戰，不但實力大損，且皆各自爲謀，減少了對革命的抗力，予革命軍以可乘之機。

第五、吳佩孚跋扈驕滿。使得和他並肩而立，不相統屬的將帥，側目相視，他的部將也多離心携貳。尤其當革命軍與師北伐之際，他却遠在北方，督師長辛店，以全力攻打國民軍。把革命軍沒有放在眼裏，留駐湘（湖南）、鄂（湖北）的兵力，比較薄弱。有人認爲他輕重倒置，多方規勸，他毫不爲動。待發覺革命軍長驅直入，大事不妙，他才專車南下，身臨前線督戰，並急調

大軍赴援。奈南北遠隔，運輸困難，絡繹於途，難應戎機。頹勢無法扭轉，全線乃告崩潰。

最後，國民軍的重大功勞，特別值得稱道。十三年首都革命，搗毀了北洋軍閥的政治中樞。囚曹錕，逐吳佩孚，直軍爲之解體。在直隸（河北）、熱河、察哈爾、甘肅、陝西、河南各省的廣大地區，建立了北方的革命武力。此後近兩年中，孤軍奮戰，力抗奉、直軍的夾攻。吸引吳佩孚率其主力北調，且予他們以重創。對於駐在兩廣（廣東、廣西）的國民革命軍，先已作了間接而有力的貢獻。以後底定甘、陝，會師中原，乃是直接參戰，其功更不可沒。

南北局勢錯綜複雜

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以後，大中國的精華腹地，全歸革命軍掌握。北洋軍閥主力之一的直軍，業已全告殲滅。由直軍衍化出來的孫傳芳所屬五省聯軍，已形殘破。只有張作霖的奉軍及其別枝張宗昌的直魯軍，尙屬完整。依照常理來說，革命軍此時應該乘勝渡（黃）河，長驅進攻，完成北伐統一的大業。

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因爲南北局勢的混沌複雜，不但未因革命軍會師中原而告澄清，且在持續演變之中。北伐軍事，乃告中挫。

從表面上看，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閥之間，一方面要掃除軍閥，統一全國，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一方則堅決反赤，冀圖頑抗，作迴光返照的垂死掙扎。似乎壘壘分明，兩陣對圓的要斷殺下

去。但如揭開表皮，就當時的情況深入瞭解，則隱藏在骨子裏的却還大有文章。

革命陣營內的寧漢分裂情況，不但未曾緩和，且因「東征」、「西討」，正謀互相殺伐。對於當面大敵張作霖，却在試探謀和。張作霖受推爲海陸軍大元帥，成爲北京政府的首領，北洋各軍，都屬於他的統一旗幟之下。但他們對於革命軍的策略，則有主和、主戰兩派不同的主張。此時的南北大局，可用縱橫捭闔，錯綜複雜，撲朔迷離，莫可究詰的四句話，來作形容。大體而言，可作如下的指陳：

南京要聯合馮玉祥，夾攻武漢，消除內憂，然後一致北伐。（這是以後一直採取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策略。）

武漢要聯合馮玉祥夾攻南京，實施「倒蔣」，然後三方合作，再行北伐。唐生智則暗中勾結孫傳芳，聯合張作霖，打算推翻南京，平分中國。南京要張作霖接受（國民）黨治，退回東北。且對孫傳芳、張宗昌，進行策反。

張作霖主張「統一不統一」。有關全國政治、法律問題，以國民會議解決，反對一黨包辦。並要聯合南京和山西，三方合作，共同解決馮玉祥。閻錫山雖然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對張作霖仍未公開決裂，且擔任南京、北京之間的調人。

馮玉祥擁兵中原，寧、漢兩方都極力爭取他，他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與他隔（黃）河對峙的閻錫山，彼此都存有戒心，虛與委蛇。張作霖則對馮極爲痛恨，

必欲除之而後快。馮玉祥此時的處境，乃成爲各方爭取打擊的焦點。表面上看起來左右逢源，實際則左右爲難，且陷於四面受敵的地步。他唯一殷切的願望，就是要消弭寧、漢之間的紛爭，合力討伐張作霖。

因此，以上各方之間，信使往還，函電紛馳，極盡勾心鬭角之能事。直令人目迷五色，無可捉摸。但經過一番折騰之後，便逐漸橋歸橋，路歸路的趨於澄清了。

現在，容我一幕一幕的說吧。

鄭州之會馮得實利

民國十六年六月，接連舉行的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對於清黨反共，繼續北伐，作出了明確的決定。其意義非常重大，影響也十分深遠，在中國現代史上應該大書一筆。對於馮玉祥來說，也奠定了他稱重一時的顯赫地位和權勢。

武漢方面對於爭取馮玉祥的合作，致力相當積極。那裏的幾位要人，跟馮關係最密切的，首推徐謙。他奉中山先生之命，早就在北方活動，與馮玉祥建立了深厚關係。十五年三月，馮玉祥赴俄時，他與同行。八月，馮派他和李鳴鐘、劉驥二人，先行回國，到廣州國民黨中央報告，率全軍加入國民黨。並洽商合作北伐的有關問題。國民政府乃任命馮玉祥爲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也任命馮氏爲國民黨代表。徐謙稍後在廣州和武漢，出任黨、政要職，即是以馮的實力爲背景。汪精衛和孫科，都在北方與馮迭有接觸，關係良好。

在武漢具有最高權威的蘇俄顧問鮑羅廷，與馮也很熟，對馮且有相當期許，馮在俄又得到大量軍火援助。積此種種原因，武漢方面與馮玉祥的關係，可以說遠比南京爲好。馮玉祥在西安期間，雙方即有頻繁的接觸。

當馮玉祥、唐生智兩部大軍，正以鉗形攻勢分進合擊，逼近鄭州、開封之時。武漢方面，爲了爭取機先，即派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爲代表，（鄧氏於十六年春間，那時南京尚未克復，蔣總司令駐節廬山。）寧漢分裂肇端之後，即脫離蔣公左右，與武漢方面沆瀣一氣。）由豫（河南）南繞道到洛陽以西的陝州，晉見馮玉祥，歡迎馮氏東來，共商今後革命進行計劃。迨鄭州既克，武漢方面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孫科、顧孟餘等，由漢口專程北上，六月六日到鄭州，會晤唐生智。並即聯電馮玉祥，請其迅即東來，面商大計。馮氏即偕鄧演達兼程東行，於十日到鄭州，汪精衛等黨、政、軍要人，齊集車站歡迎。十一、十二兩日，連續舉行會議，商定要案多件。

一、黨務方面：

組織開封政治分會，爲河南、陝西、甘肅（那時青海和寧夏尚未分省設治。）三省的黨政最高指導機構。以馮玉祥、于右任、徐謙、顧孟餘、王法勤、于樹德、鹿鍾麟、劉伯堅、薛篤弼、郭春濤、楊明軒等十一人爲委員，馮玉祥爲主席。

二、政治方面：

成立河南、陝西、甘肅各省政府。河南主席

馮玉祥、陝西主席于右任（會後于赴武漢，未就職，由石敬亭代理）、甘肅主席劉郁芬。

三、軍事方面：

1. 河南、陝西、甘肅三省，一律劃爲第二集團軍的防地。豫南、豫北、豫東之殘敵，一律由馮軍負責肅清。

2. 駐在河南境內，歸附革命的雜軍，均由馮軍收編，賦予第二集團軍的統一番號。

3. 唐生智、張發奎等部，回師武漢，安定鄂（湖北）、湘（湖南），鞏固後方。

革命武力馮軍居多

由以上各項決定來看，包括河南、陝西、甘肅各省的中原和西北廣大地區，所有黨、政、軍全部重實大權，完全歸於馮玉祥掌握，是乃馮氏一生最煥赫的時期，也是他負擔最沉重的時期。

馮玉祥此時所統率的軍隊，連同嫡系及新附的雜軍，共達四、五十萬人之多，算是他一生擁兵最多的時期。除了總部直轄的四個軍十一個師以外，另編成九個方面軍，分別由孫良誠、靳雲鵬、方振武、宋哲元、岳維峻、石敬亭、劉郁芬、劉鎮華、鹿鍾麟等人，擔任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方面軍總指揮。（第六方面軍總指揮原爲于任右，于未就，改由石敬亭繼任。）總兵力共爲三十二個軍，五十三個師。（尚有若干番號待查的獨立師、旅。）在這九個方面軍中，第一、三、四、五、六、七、九等七個方面軍，是國民黨聯軍原來的部隊。其中第三方面軍是原來的國民五軍，（方振武原屬張宗昌，十五

年春投歸國民軍。第五方面軍是原來的國民二軍，其他五個方面軍都是馮的嫡系。第二方面軍是由河南保衛軍（源出直系的主力之一）改編而成。第八方面軍是收撫鎮嵩軍改編而成。第九方面軍編成較晚。第四、七兩個方面軍所轄兵力較少，擔任陝西、甘肅地區的後方警備任務。其他各方面軍都在前方擔任作戰。

此時蔣總司令自兼的第一集團軍，共轄三個路，十三個軍、三十六個師、三個獨立旅。其中屬於由兩廣（廣東、廣西）、湖南出動北伐的第一、三、七各軍的部隊，約佔總兵力五分之一，此外絕大多數是收編敵軍及各省地方性的部隊。第三集團軍閻錫山尚在觀望，暫不計入。第四集團軍共轄兩個方面軍，九個軍，二十六個師。全部革命軍合計起來，以第二集團軍的兵力為數較多。以後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因圖謀叛變，被消滅改編，第三方面軍投歸第一集團軍，雙方總兵力互有消長。

鄭州之會，除了上述各項重要決定以外，還有對馮玉祥影響最大，也可說是對革命全局影響最大的，就是武漢北來諸人，紛紛將俄、共黨徒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各地跋扈兇暴，及蘇俄顧問鮑羅廷陰險專橫種種實情，向馮詳述，且皆甚表不滿。其中以徐謙、顧孟餘兩氏，及唐生智的部將劉興、何鍵等人，所言尤為痛切。馮玉祥對於共產黨徒在陝西各地的橫行不法，本已極度痛惡，惟以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他只好隱忍不言，以免背上「反革命」或「違黨紀」的罪責。現在得知黨中要員及軍中將領，均有

此同等感受，乃加強了他清黨反共的決心。因而於稍後舉行的徐州會議中，立即站在蔣公的一邊，厲行清黨反共了。

蔣公與馮結合經緯

蔣總司令對於團結各方實力，完成國民革命，高瞻遠矚，無所不照。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夕，遠在北方的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直大軍激烈拼鬥，處境日漸不利。他於元月六日在國民黨二全大會所作的軍事報告，就提出即行北伐的主張。四月三日，又向中央正式提出北伐的建議。皆以減輕馮軍所受的壓力，南北呼應為着眼，惜均未能實施。八月，他軍次長沙，聞馮玉祥的代表徐謙、李鳴鐘、劉驥等到達廣州，立即電請廣州有關負責人士，速與洽商南北兩軍密切聯繫共同作戰的辦法。以後徐謙出任國府要職，劉驥一直跟着由廣州北遷的中央，代表馮氏接洽一切。李鳴鐘則轉往蔣總司令行旌所在地，擔任馮玉祥的代表，隨時承商聯絡，保持密切關係。十六年春，馮玉祥到西安。蔣總司令即派彭程萬統道赴西安，作為他在馮處的代表。這樣一來，蔣、馮之間，不但函電常通，而且互有高級代表居中聯繫，雙方的關係，乃臻熱絡。

此外還有蔣公和馮玉祥共同看重，公證私交均深的兩個人——黃郛和李烈鈞，在中間極力溝通拉攏，所起的作用很大。黃對此致力尤深，他認為革命軍進抵中原，北洋軍閥雖成尾聲，但北軍合力，其勢仍不可侮。而革命軍內部已告分裂，蔣公可用之兵既少，又不堅強一致。爲了迅速

結束內戰，應爭取各方可用的力量。在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兩大勢力，無論思想、歷史和他個人的友誼，均可拉來與蔣公合作。尤以馮玉祥關係最大，他駐軍於扼京（平）漢、隴海兩大幹線的中原，進可以控制津浦線。馮若與武漢合作，則南京頓感威脅。若向南京，則武漢即難立足。他在北方與馮有長時期的深交，又有民國十三年首都革命的患難歷史。許多人批評馮很「虛偽」「易變」，黃則認爲馮的國家觀念不薄，移風易俗之志甚切，做得過火而已。然艱苦從行伍出身，知他者不多，蔣公和南京的黨政要人，對馮認識都不深。他與蔣公誼結金蘭，此時正受倚重，建言定策，率多採行。以他與雙方的深厚關係，從中拉攏，自極得力。爲了促成蔣、馮合作，如果他親自奔走，收效必較容易。可是蔣公對黃另有借重，不能放其遠離，乃接受黃氏介紹，以王正廷代黃，往駐馮處爲代表。馮玉祥與王正廷係舊交，即以王爲隴海鐵路局督辦（局長）兼鄭州市長，表示對蔣公及黃郛的尊重。此外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蔣公會以親筆函及密電本，交由馮玉祥派在南京、與李鳴鐘一起辦事的毛以亨，由海路繞道天津、山西，前往陝西見馮，致殷切爭取之意。蔡元培、吳敬恒、李煜瀛諸人，也皆有親筆信致馮，力主清黨反共，交毛帶去。毛以亨在潼關見到馮玉祥，面呈上述諸函，並作了詳細報告，馮氏清黨反共之意遂決。以後鄭州，開封、徐州，接連克復，隴海鐵路全線打通。鄭州會議甫行開罷，馮玉祥即派毛以亨赴徐州，晤見李宗仁、白崇禧，經過一番長談，李、白即電南

京向蔣公報告，蔣公乃決定與馮在徐州會晤。於是決定中國政局發展的徐州會議，乃告揭幕。

馮赴徐州蔣公殊遇

蔣總司令於六月十六日，乘夜車離開南京，馮的代表李鳴鐘同行，十七日到徐州。立即電請馮玉祥來徐，共商黨、國大計；馮氏接電即由鄭州東行。蔣公對於馮氏此來，待以最大的殊禮。他於馮氏離鄭東行之時，派遣代表何成濬、方本仁，偕同李鳴鐘、毛以亨，先到鄭州、徐州之間的商邱（歸德）車站迎候。蔣公本人率同李宗仁、白崇禧、賀耀組等高級將領，親迎於徐州以西的黃口車站。馮於十九日到黃口，即進入蔣公的專車，同赴徐州，這是馮玉祥與蔣公及南方將領第一次見面。當互通姓名時，因南北口音不同，誤以賀耀組為何應欽，賀立即遞上名片正名，亦趣事也。南京方面趕來與會的黨、政要人胡漢民、張人傑、吳敬恆、李煜瀾、蔡元培、鈕永建、黃郛、李烈鈞等，則在徐州近郊的九里山麓車站歡迎。政治場合，真是非常現實，觀於鄭州、徐州兩次會議時，寧、漢兩方對於馮玉祥的歡迎款待之隆重，在馮玉祥一生中真是風光極了。再看以後的離合變化及其對國家的重大影響，誠不勝感慨系之！

先寫兩則有關人物的初步印象，再及會議的正題。

馮玉祥在所著「我的生活」一書中，對於初見蔣公，有下面一段記載：「我的車子過了礪山——距徐州還有一站——，迎着蔣先生親自乘着的

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為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業中得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丰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

黃旭初在其「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係」一文中，記述李宗仁初見馮氏的印象：「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製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與我們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當晚（六月十九日）在徐州東門大街花園飯店，舉行盛大宴會。蔣公首先致歡迎詞：「此次南北軍事領袖，把臂言歡，商洽黨國大計，意義極為重大，真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馮玉祥繼起發言：「直、奉的軍閥吳佩孚、張作霖，每說南北雙方的赤化頭子，是蔣介石和馮玉祥。其實我們何嘗赤呢？我們的赤是赤心、赤膽、赤手，為着赤子們去革命。他們想殺我們，就給我們一頂赤帽子戴上。現在兩赤見面，就是爲了救中國。這次第一集團軍北伐的功勞，我很敬佩。……」吳敬恆緊跟着說：「今天在這裏，可說是紫氣東來。我們的赤，是赤裸裸的三民主義，純潔無瑕，不含渣滓，以總理的三民主義救中國。……」宴會就在這樣傾心交談，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盡歡而散。

席散以後，即由李烈鈞和黃郛居間，李煜瀾、吳敬恆不斷奔走，溝通蔣公和馮玉祥的意見。因黃、李兩人與馮有深交，共過患難。李、吳兩人在北京時與馮亦熟。說話比較方便。當時蔣公

認爲，北伐正在順利進行的中途，俄共黨徒利用國民黨內左傾的野心政客和軍人，篡黨竊權，背叛中央，造成寧漢分裂的悲劇。唐生智竟然狂呼「東征」，準備與師東進，陰謀顛覆。這不但阻礙北伐，而且自殘同類。因此，對於武漢的反黨行動，必須早日撲滅。故擬以第一集團軍的一部兵力，扼守江蘇和山東的邊境，以固京畿。而以渡江北伐的主力，撤回原防，溯（長）江而上，直搗武漢。希望馮玉祥由河南出兵，沿京（平）漢鐵路南下，向武漢兩面夾攻。先清內部之憂，然後移師北伐。

這是國民政府以後一貫採行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策略。可是馮玉祥對此却不表示同意，他有其看法和主張。

雙方意見未會溝通

馮玉祥認爲當面的奉、直魯軍和孫傳芳的殘部，才是國民革命的真正敵人，應該首先以全力將其消滅。如果此時對武漢用兵，則敵軍傾巢而出，我軍腹背受敵，北伐大業將有敗於垂成的危險。武漢方面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糾紛，汪精衛、譚延闓、孫科諸人，皆是居於領導地位的黨中菁英，唐生智、張發奎兩部，更是北伐進兵，戰績輝煌的革命精銳武力。他們雖左傾而繼續容共，但究竟不是共黨份子。政見縱有異同，儘可設法消解，不宜訴諸武力，自相殘殺，給敵人一個反撲的機會。就其時國民革命的全局來看，馮玉祥的這一說法，確實冠冕堂皇。就他本身的處境來看，則更有很大的顧慮。他以連續兩年，轉戰數